

《“文獻保存同志會”第二號工作報告（1940年5月7日）》

考釋

李 慧

內容提要：本文節錄《“文獻保存同志會”第二號工作報告》中所述及的古籍購買細目，利用國家圖書館館藏《西諦購書收據》（館藏號：XD11275），以及《鄭振鐸書信集》中致張壽鏞先生的部分信札，三者相互對照，進行考釋，試圖揭示1940年4月2日至5月7日，“文獻保存同志會”搶救珍貴古籍的細緻工作。

關鍵詞：文獻保存同志會 工作報告 西諦 購書收據

1940年1月由鄭振鐸、張壽鏞、何炳松、張元濟、張鳳舉五人成立的“文獻保存同志會”，於國家民族危亡之際搶救民族文獻，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義，他們的功績有待深入發掘。從1940年4月至1941年6月，鄭振鐸共有九次工作報告給時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，這些報告約在1949年被帶到了臺灣。經由陳福康先生注釋，大陸學者得以窺見報告全貌。國圖所藏《西諦購書收據》多為購買古籍的收據與發單，相關事實可與工作報告、鄭振鐸致張壽鏞信札中的內容互見，這些資料雖分屬兩岸，然共同見證了這一搜救盛事以及各方人士保存文脈的赤誠之心，也使得保存同志會各成員的功績有跡可循。拙文仍遵循第一號工作報告的釋讀方法^①，節錄工作報告所述及的古籍細目，再加上鄭振鐸致張壽鏞先生的信札，三者相互對讀，試圖還原搶救工作的進程。

此批館藏購書收據存單，西諦先生當時已做了編號，如：收據丙××號；行文中收據落款的民國紀年均換作公元紀年，收據上實洋×××元均祇將金額數字照錄。

慰堂先生：前上一航函（第一號）想已收到。群碧樓鄧氏書，已以五萬五千元成交。其中善本，約有三百數十種。以抄校本為最多（大多數為寒瘦目所著錄）。抄本中最可貴者，有季滄葦輯《全唐詩》（膳清本）百五十八冊，邵二雲、孔莊谷抄校本《舊五代史》十四冊，孫淵如、嚴鐵橋批校本《春秋分紀》十七冊（原底為明抄本），蔣西園手抄，鮑以文、顧千里、葉廷甲合校本《梧溪集》六冊，何義門批校本《三唐人集》八冊……明內抄本《明太祖實錄》一冊等。

刻本之佳妙者有：弘治黑口本《孟東野集》，明初奉影刊本《賈浪仙集》（有黃跋）（此二種即鄧氏所謂“寒”“瘦”目中之精華也），正德本《賈太傅集》，趙定光刊《玉臺新詠》，明仿宋本《鶴林玉露》；嘉靖刊本《草堂詩餘》，《樂府古題要解》（單刻本），《錦繡萬花谷》，《南豐文粹》，《唐人萬首絕句》，《唐文粹》，《李杜詩》……元

刊殘本《本草》……又有汲古閣所刊書十六種，內聚珍板書近八十種。計凡善本書三千數百冊；普通書近九百種。中亦多大部之叢書。鄧書全部，據平賈估價，在十四萬元以上，且競購甚力。故我輩商議再三，不得不忍痛以五萬五千元成交。

按：西諦購書收據中編號為收據總7的，是1940年4月9日孫伯淵所立收條，另有一4月10日的收據，內容相同，增鈐有“博山”印，并署潘博山見證（潘博山即潘承厚，參與收購玉海堂及群碧樓書，可參《求書日錄》記載）。收據云：“鄧氏群碧樓藏書，計法幣伍萬伍仟元整。書目另附一冊。”該二號工作報告中所詳列群碧樓各書，在館藏《西諦購書收據》中未見相關的收據或發單，疑因書目另附一冊，批量成交之故。《鄭振鐸先生書信集》中1940年4月3日致壽鏞函后附有商談群碧樓書時書商孫伯淵開來的詳帳。

西諦先生購買群碧樓的書頗費周折，第一號報告中已述及部分。4月3日西諦信中曾提及擬細加剔除群碧樓書，選存五十種，計碼洋共二萬五千餘元，如還以五折，共約一萬二千餘元。由4月7日西諦信可知，因文祿堂王晉卿出價五萬五千元，事情有了突變，“如不能出到五萬五千元（善本及普通書均在內）者，則祇好售予平賈矣。”最終於9日或10日購進此批書。故4月11日函載：“昨日下午，由孫賈送來群碧樓各書（已運滬之一部分），業已點收無誤，（計共三千一百餘冊）。佳本續紛，應接不暇。”“尚有‘普通書’（中亦有元刊本數種及內聚珍等）十倍於此數者。孫賈云：全數近四萬冊。（此數似不大可靠；然有書目可點查。）大抵三萬冊以上之數必可有。款已全數交與孫賈。”四月底進行鄧氏普通書的點收工作，4月25日鄭函云：“督視孫賈點交鄧氏普通書”，“約共二萬冊左右。（未計算）。不在底賬中之書，約有十餘細”，且“普通書中亦有‘善本’在。如元刊《唐文粹》及《本草》均甚佳。內聚珍各種亦佳”，“至孫賈所云‘四萬冊’，實妄言也，殊為不快”。^②

此外尚以五百元之代價，向宗禮白購得：元刊本《天目中峰和尚廣錄》，殿本《盤山志》，乾隆本《寶鷄志》及《泰山志》等四種。

按：1940年4月2日鄭函載：“瞿鳳起先生介紹宗湘文氏書四種，元刊本《中峰和尚廣錄》及《寶鷄志》等均少見，原索六百元，經與瞿先生詳商，大約五百元可購得。”^③而收據丙39則詳載：“茲收到元刻《中峰廣錄》十本，殿版《盤山志》十本，《寶鷄縣志》六本，《泰山志》二十四本。四種共伍拾本，價款國幣伍佰圓整。”由宗咫園於1940年4月開具，西諦備注4月5日付清。

以二千元之代價，向鐵琴銅劍樓購得：宋刊本《毛詩注疏》，宋蜀刊《宋書》（中多明補校），明藍格抄本《實錄》（計八冊，洪武及永樂三朝，皆不全）。明嘉靖刊本《古今說海》（中有抄配），明刊本《春秋經傳集解》（原作宋刊誤），明黑口本《黃石公素書》，明黑口本《說文五音韻譜》，明正德刊本《鄭少谷文集》，明嘉靖刊本《野紀》，及《陽明文粹》，明刊本朱應登《凌溪集》等十五種。以上皆在四月份中成交者。

按：1940年4月23日鄭函云：“瞿氏又交來書十五種，均佳；《毛詩注疏》尤為上品。（宋板）價共二千四百二十元，但可以二千元成交。（正在商，瞿君尚有難色）。”

又4月24日云：“奉上鐵琴銅劍樓書十八冊（計十三種）。尚有蜀本《宋書》（元、明補）及《茶經》尚在裝修，故未能一併奉上。共估價洋二千四百二十元。（後）允以二千元成交。至《春秋經傳集解》原亦作宋刊，但鳳起明言，實為明翻本。可見其誠篤！”4月25日云瞿氏書“以宋板《毛詩》為最佳，次為《宋書》，及《左傳》”，故“有此數種，二千之數，已不為昂也”。^④收據總9所列書名前有每部價格，後有冊數，分別有：《明實錄》八本200元、《春秋經傳集解》二十八本200元、《古今說海》十二本200元、《宋書》卅二本350元、《毛詩》二十四本800元、《黃石公素書》二本80元、《野記》二本80元、《陽明文粹》四本60元、《陰符經》等七種二本80元、《許說文》六本60元、《凌溪集》三本100元、《今獻彙言十三種》六本60元。收據與報告稍有差別，且總價已超二千元。西諦先生備註云：“此為鐵琴銅劍樓瞿氏書，託中國書店代為估價並代開發票者。”落款時間為1940年4月27日。亦與信札內容吻合。而未見之《鄭少谷文集》則記錄於另一件4月27日中國書店發單之中，為二本，70元，與《茶經》《崇德書院》兩種共計兩千元購入，當同為鐵琴銅劍樓委託中國書店之書。

至上函所云李氏書，已成交。共一百三十餘箱，一萬數千冊（尚未點查完畢）。價共三千六百元。

按：此李氏書見於第一號工作報告，又1940年4月16日鄭函云：“到法寶館裝李氏書。敝意李氏書，提出善本書若干種後，亦以裝大木箱為宜。以可騰出書箱來裝群碧普通書。”^⑤

尚有陶蘭泉明板書七八十種，集部居多，抵押於鹽業銀行者，亦可以四千元左右成交。

按：1940年4月23日鄭函載“陶蘭泉氏書款四千元，其支票已開來”。^⑥

又北平修綏堂孫賈，頃南來，持善本書四十餘種求售。經仔細揀選後，留下十餘種，皆甚精。中有宋刊本《王臨川集》（明印），元刊本《國朝文類》，元刊本《道園學古錄》（元印極佳），元刊本《輟耕錄》（至遲為明初所刊），成化本《宋論》，舊抄本《草堂雅集》（徐渭仁跋），明刊本《秋崖小稿》，《渭南文集》（均白棉紙）等等。價約三千數百元，尚未商妥。

按：1940年4月24日鄭函云：“修綏堂各書曾抽出數種，請菊老（張元濟）鑑定。菊老來函所云：《輟耕錄》陶蘭泉曾摹刻小字本，實則此即蘭泉摹刻底本也。”^⑦此批修綏堂未商妥書後於6月購入，1940年6月6日北京修綏堂書店發單中見《輟耕錄》《渭南文集》《草堂雅集》和《國朝文類》，與《舊五代史》等（亦見於第三號工作報告）以2000元購入。

至零星在各肆所購善本，亦有足述者。稿本及抄校本有：

（一）《石門詩存》（稿本）

按：1940年4月8日西諦先生致壽鏞云：杭賈某來滬，攜來數書，為選明刊《世說新語》及《石門詩存》二種，價共一百二十元。《石門詩存》為稿本，未刊，似尤可貴。^⑧據收據丙37，1940年4月12日發單，自上海中國書店購入《石門詩存》六本

(70元)等四種，共400元。

(二) 嘉靖藍格抄本《說郛》(一百卷，陶蘭泉舊藏，聞為張宗祥校印本所據，而張本誤字闕句甚多，此本足以補正不少)

按：1940年4月25日致壽鏞信中言及此本，云：“又北平修文堂孫賈實君寄來明藍校抄本《說郛》(嘉靖鈔)全部，凡一百卷，十套，六十四冊，極佳，本為陶氏物，索一千元，約八百元可成交。似亦不甚昂。此亦張氏校印本所據者(商務出版)。張校本中多誤字闕文，賴此補正者甚多，故亦甚可重視也。”4月30日云：“《說郛》亦以八百元成交，似不能算貴。”^⑨西諦收據總10附一為1940年5月1日北京修文堂書店的發票，內記《說郛》明藍格抄，六十四冊，800元。信札與收據存單內容正合。

(三) 魯燮光輯《蕭山叢書》(稿本)，(四)《永興集》(稿本)，(五)魯氏《西河書舫藏畫錄》(稿本)，(六)《海甸野史》(舊抄本)。

按：1940年4月19日鄭函記載，來青閣曾購得西泠印社底貨八十餘網，鄭得該肆《蕭山叢書》等十餘種，有抄本《海甸野史》一部，索八十元。^⑩又據收據丙40，1940年4月來青閣書莊發單載：“舊抄本《永興集》八本，又《蕭山叢書》八本，又《王遂東先生尺牘》一本，又魯氏《西河書舫藏畫錄》一本，合三百元”，“抄本《海甸野史》八本，八十元”，有西諦標注為4月18日付。

(七)《黃勉齋集》(知聖道齋抄本)

按：收據丙30，1940年4月4日上海樹仁書店發單中載有此本，“十本，七十元”。

(八)《杜詩箋》(湯啟祚稿本)

按：1940年4月北京景文閣書店開具的收據和發單皆有此本，發單較詳，載：“《杜詩箋》舊抄本，十二冊，洋一百二十元。”

(九)《臺灣恒春縣志》(中央研究院所藏)

按：收據丙35，1940年4月14日上海積學書社發單載：“《臺灣恒春縣志》抄本，捌冊。計實洋貳佰圓。施先生台升。幣代付，已收訖。四月九、十三、十四日。”此施先生遍查不詳。

(十)《神器譜或問》(舊抄本)

按：1940年4月6日北京直隸書局開具的收據即為《神器譜或問》，30元。

(十一)《詹氏玄覽》(舊抄本)

按：1940年4月30日北京修文堂書店發單有《欣賞編》四冊，《暖姝由筆》二冊，《詹氏玄覽》二冊，共計實國幣貳百元整。

(十二)龔孝拱批校《積古齋鐘鼎款識》

按：共有三件發單提及此本與其他古籍一同購入，160元(後計入總價有折扣)，龔孝拱批或龔氏批校，其中兩件標明發自北京文殿閣，1940年10月王淳馥具。發單時間晚於報告上報時間(5月7日)，當是集齊其餘書籍或錢款交割等因素致有延遲。

(十三)王西莊批校《李詩補注》

按：收據丙25，1940年3月19日蘇州文學山房江靜瀾發單載：“稿本《三體摭

韻》十冊，鈔本《皇輿考乘》四冊，王批《李詩補注》五冊，以上計實收洋壹佰貳拾元正。”

(十四) 翁同龢校《蘇詩補注》(以宋本校，闕文幾皆補全，極佳)等

按：收據丙 33，1940 年 4 月 7 日上海樹仁書店發單當為此本，“《批本蘇詩補注》二本。計洋六十元正”。

刻本有：(一) 明初小字本《春秋屬辭》(向皆以為元本)

按：收據丙 23 為 1940 年 3 月 19 日北京文殿閣王淳馥收到預付書款的收據，西諦先生在旁側做了備注，“此為付《春秋屬辭》《楊文敏集》等書款，因未決定，故未結帳”。而到了 10 月，王淳馥的發單中即含此《春秋屬辭》，元刊，180 元(後計入總價有折扣)。此發單時間亦延後，另北京文殿閣王淳馥所開具 1940 年 10 月發單有多件，當為集中批量交易。又一時間不詳發單中所收疑即此本，160 元、十冊。

(二) 明刊本《楊文敏集》

按：收據丙 23 內容同上條。10 月王淳馥的發單標為“二百六十元，《楊文敏公全集》，明刊”，另有兩件時間不詳發單，分別為“260、《楊文敏全集》”和“《楊文敏集》六冊”。

(三) 元刊明補本《文公經濟文衡》

按：1940 年 4 月 6 日林少懷收據存一“明刊白棉紙《經濟文衡》六本”，與其他書以 320 元購入。另一收據丙 34 內容基本相同，“明刊《陶淵明集》四本，明刊《經濟文衡》六本，明刊《巢氏病源》十六本，明刊《莊子翼》八本。計實國幣叁百念元正”，書款兩訖，林少懷抄。僅時間稍差，為 4 月 7 日。

(四) 嘉靖本《西軒效唐集》，(五) 嘉靖本《稽古錄》，(六) 嘉靖本《唐荆川文集》

按：此三種見收據丙 28，1940 年 3 月上海來青閣書莊發單，“明板白紙本《西軒效唐集》四本，實五十元；明板白紙本《稽古錄》四本，實六十元；明板白紙本《唐荆川文集》六本，實五十元……共揭國幣伍百肆拾元整”。

(七) 嘉靖本《三子通義》

按：“通”字誤。1940 年 4 月 7 日鄭函曰：“中國書店送來之《三子口義》一部，係嘉靖原刊本，似甚佳。索價一百四十元。”^⑩同上“《石門詩存》”條，收據丙 37，1940 年 4 月 12 日發單載自上海中國書店購入《三子口義》十本(140 元)等四種書共計 400 元。

(八) 嘉靖本《大觀本草》

按：兩件年份不詳的上海來青閣書莊發單和收據都提到《大觀本草》，“明板皮紙《大觀本草》，實一百四十元”。還有一年份、書店皆不詳的發單載：“明皮《大觀本草》，入一百四十元”，當為來青閣發單之同一明本。另收據丙 40，1940 年 5 月 1 日北京修文堂書店發單中有一《大觀本草》，未著版本，三十冊、190 元，與《陳後山集》《思問編》等四種共計 500 元。此兩種《大觀本草》未知孰為嘉靖本。

(九) 明初黑口本《陳後山集》

按：收據丙 40，1940 年 5 月 1 日北京修文堂發單載此《陳後山集》為十二冊、160 元購入。

（十）明刊本《巢氏病源》，（十一）明刊本《莊子翼》

按：同上“《文公經濟文衡》”條，見於 1940 年 4 月 6 日林少懷收據，“明刊白棉紙《莊子翼》十二本，明刊白棉紙《巢氏病源》十六本”，與其他兩種書以 320 元購入。收據丙 34 亦載“明刊《巢氏病源》十六本，明刊《莊子翼》八本”等四種計國幣叁百念元正，書款兩訖，林少懷抄。僅時間稍差，為 4 月 7 日。

（十二）明刊本《春秋左傳注評測義》（凌稚隆）

按：收據、信札未見。

（十三）明刊本《欣賞論》

按：“論”字當為“編”。見上“《詹氏玄覽》”條，1940 年 4 月 30 日北京修文堂書店發單載此書四冊。

（十四）明刊本《升庵韻學七種》（較《函海》所刊者多出二種）

按：收據、信札未見。

（十五）明刊本《思問編》

按：收據丙 40，1940 年 5 月 1 日北京修文堂書店發單中記有一《思問編》四冊，60 元。

（十六）明刊本《殿閣詞林記》（建本，少見）

按：1940 年 5 月 1 日北京修文堂書店發單有《殿閣詞林記》四冊，100 元，《名山藏》四十冊，400 元，共計五百元整。

（十七）萬曆本《河防一覽》

按：收據丙 11 附件，1940 年上海中國書店發單存一記《河防一覽》四十元。另有一時間、書店不詳的發單也錄有《河防一覽》40 元，應為同一本。另一信息不詳發單，記載此《河防一覽》為二十冊，600 元。又 1940 年 4 月 23 日鄭函載：“昨日在中國書店得萬曆本《河防一覽》八冊，（價四十元），甚為得意！”^⑫可推知發單四十元購入的即為萬曆本。

（十八）《平播全書》（原刊本，極罕見）

按：1940 年 4 月 7 日鄭函云：萬曆版《平播全書》一部，（來青閣書）極罕見，（雖《畿輔叢書》中有之，然原刊從未見過）初望甚奢，欲售八百元，又云：可售二千元。從知《畿輔》中已刊過，乃突跌價至三百餘元。經商妥：以三百二十元成交。是否可購，仍乞決定。蓋此類“史料”書，價格飛騰，似不能以其為萬曆竹紙本而忽視之也。^⑬收據丙 27，為 1940 年 3 月 19 日上海來青閣書莊發票，載：“明板孤本《平播全書》十五本，計國幣叁百貳拾元整”，即為此本。

（十九）萬曆本《慎餘錄》（極罕見）

按：同上“《石門詩存》《三子口義》”條。見收據丙 37，1940 年 4 月 12 日發單，自上海中國書店購入此《慎餘錄》十二本，160 元。

（二十）萬曆本《暖姝由筆》（徐充撰，末附《汴遊錄》，罕見）

按：見上“《詹氏玄覽》”條，約為1940年4月底自修文堂書店購入。

(二十一) 崇禎本《名山藏》(完全者罕見)

按：1940年4月8日鄭函云：“平賈孫寶君送來《桂洲奏議》及《名山藏》各一冊；《名山藏》共二零五卷，四十冊，索四百五十元。”^⑭由上“《殿閣詞林記》”條可知《名山藏》最後以四百元成交。

(二十二) 天啟本《盟鷗堂集》(黃承充作，存奏議五卷，多關倭事，極罕見)

按：1940年4月23日鄭氏信札中提及此本，“又從修綏堂打包書中(原擬寄平者)抽取《盟鷗堂集》三冊(雖殘，極佳；中多征倭史料，故雖價昂至四十元，亦收之。)”^⑮《西諦購書收據》中存1940年4月23日北京修綏堂書店發單，記此本為二冊，四十元。

(二十三) 清初刊本《倘湖外堂六種》(《春秋志在》等均罕見)

按：此本書名有誤。同上“《杜詩箋》”條。1940年4月北京景文閣書店開具的收據和發單皆有此本，發單較詳，載為“《來集之倘湖外書六種》，清初刻本，三十冊，洋一百五十元”。又1940年4月19日鄭函提及趙斐雲(萬里)將寄來《神器譜或問》(抄本)，《杜詩箋》(抄本)，《河東鹽法錄》及來集之《外書》等^⑯，亦可證“書”字訛為“堂”。

(二十四) 開花紙印本《棟亭詩文詞錄》

按：收據總10附三，1940年5月1日北京修文堂書店收據，載：“《棟亭詩文詞鈔》四冊，100；《唐千字詩》涉園影明抄，四冊。共計實國幣壹佰元整。”

(二十五) 乾隆本《河東鹽法調劑記恩錄》

按：“記”字誤。同上“《杜詩箋》《倘湖外書六種》”條。1940年4月北京景文閣書店開具的收據和發單皆有此本，發單較詳，載為“《河東鹽法調劑紀恩錄》乾隆刻本，六冊，洋七十五元”，凡三種書共計洋345元。

(二十六) 內聚珍本《吏部則例》(凡六十九卷，較陶氏著錄者多出十卷)等等

按：1940年4月25日鄭函載：“昨在中國(書店)，得‘內聚珍’《吏部則例》，凡六十九卷，二十二冊，極罕見，價一百六十元。蓋不在‘聚珍版叢書’中者。”^⑰

注釋：

①李慧：《文獻保存同志會第一號工作報告(1940年4月2日)》考釋，《文津學誌》第三輯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，2010年，36—43頁。

②劉哲民、陳政文編：《搶救祖國文獻的珍貴記錄——鄭振鐸先生書信集》，學林出版社，1992年，33—64、65、67、74頁。

③同上，32頁。

④同上，72、74頁。

⑤同上，68頁。

⑥同上，72頁。

⑦同上，73頁。

⑧同上，66頁。

- ⑨ 同上, 74、77 頁。
- ⑩ 同上, 69 頁。
- ⑪ 同上, 65 頁。
- ⑫ 同上, 72 頁。
- ⑬ 同上, 65 頁。
- ⑭ 同上, 66 頁。
- ⑮ 同上, 72 頁。
- ⑯ 同上, 70 頁。
- ⑰ 同上, 74 頁。

作者單位：國家圖書館古籍館